

生命哲学在中国

董德福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生命哲学在中国

唐德刚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生命哲学在中国

董德福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哲学在中国/董德福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11
ISBN 7-218-03633-3

I. 生… II. 董… III. 生命哲学-研究-中国 IV. B0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0993 号

责任编辑	卢 权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封面设计	陈钧生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中山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3633-3/B·118
定 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董德福同志的《生命哲学在中国》即将出版，我非常高兴。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而又不大被人重视的课题，由他写成专著，值得庆贺。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如果说 19 世纪下半叶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认识，尚处于表层、片面的阶段，那么，到严复翻译八大西方学术名著和梁启超发表《泰西学案》，就标志着深层次全面引介西方文化的开始。至“五四”时期，近代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科学实证主义三大思潮。一时间，马克思、易卜生、尼采、柏格森、罗素、杜威等思想界巨匠的名字，为中国知识界所熟知，在短短的十几年里，西方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异时态的学术纷争，在中国被共时态地重演了一遍。

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自然成为知识界最重要的研究课题，科学实证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表现形态，也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人本主义思潮及其在中国的复杂影响，却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同属人本主义思潮，人们对尼采哲学及其东传的研究兴趣，又在柏格森生命哲学之上。关于后者，直到近年，才有几篇讨论文章问世，专著有 1988 年上海三联书店出

版的陈卫平与施志伟合著的《生命的冲动——柏格森和他的哲学》。该书侧重于介绍柏格森哲学，并从历史的角度，初步论述了柏格森生命哲学东传的历程，为我们全面了解柏格森哲学及其在中国的流变，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但该书对柏格森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亲和力”，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与现代新儒学之间的内在关联，缺少深入系统的分析，关于柏格森对早期“新青年”派以及朱谦之、李石岑、张东荪、陈立夫、贺麟、冯友兰、方东美等所产生的影响，更未深究。这些缺憾，就成为董德福同志撰写《生命哲学在中国》这本书的缘由。因此，本书除了介绍柏格森哲学及其东传外，主要是论述柏格森生命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文化思想的复杂影响。

就柏格森哲学本身而论，它是不断创新的动态系统。在他早年的博士论文《时间与自由意志》（1889）一书中，柏格森表达了一个二元的观点：哲学与科学的对立、时间与空间的对立、性质与数量的对立、直觉与理智的对立，它们彼此互不关涉，各成一独立系统。到了1907年《创造进化论》问世，一个全新的思路即已出现，柏格森不再坚持早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提出了一个完全的一元论哲学。他不仅确立了生命冲动作为宇宙之原的根本原理，并且仔细地分析了如何由活泼泼的生命之流，形成物质世界与生命世界的分殊。可以说，创造进化论出，柏格森全盘形而上学的纲维立。他在1932年的《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一书中，又对此作了最后的发挥。民国以来，我国曾有一些人介绍过柏格森哲学，除了个别学者（如张君勱）对它作过潜心研究外，多数人对柏格森哲学体系不能作全面的把握和介绍，加之《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一书出版较晚，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自然谈不上了解柏格森哲学的全貌了。苛刻地说，即使像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对柏格森哲学也只是一知半解。他们往往凭自己的思想能力，以“我注六经”的传统方式来

解读柏格森，以张扬儒家人文主义的价值，对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实际上，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下，他们更愿意从实用的原则出发，汲取柏格森哲学的精神资源，为儒学复兴张目，而对从学理层次上准确把握柏格森哲学的义谛则缺乏热情。

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相互激荡。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限制科学理性的普适性价值，凸现直觉方法的认识论意义，强调生命冲动对于宇宙的本源性地位，对自由意志和意识绵延的神秘性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赞美。作为一股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源自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反动，具有内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禀性。考察生命哲学的东传史可以发现，除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新青年派”将它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利器之外，在现代新儒家学者以及具有类似思想倾向的人那里，无不以它为弘扬儒家人文主义精神，反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职是之故，本书作者从哲学义理上剖析生命哲学的特质及其东传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通读《生命哲学在中国》全书，我们不难发现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对历史上被遗忘的人物和论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朱谦之、张东荪、李石岑等人都是享有重要地位的哲学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哲学思想未能引起学界相应的重视，在哲学史教科书中没有他们的篇章，几乎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本书在毫无参考成果的情况下，经多方求索，挖掘材料，苦心钻研，对于柏格森生命哲学对这些人的哲学建构分别产生的影响，首次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同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和李大钊引介柏格森

哲学作为反封建主义利器这个论题，长期以来也不被学界所关注，本书则专设一节加以讨论，并借此对生命哲学在中国的复杂流变进行论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这不仅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也是它学术上的一大贡献。

其二，介于哲学与史学之间的研究论式。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侧重于介绍生命哲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理论特质，以及中国学人对它的介绍、研究、利用概况；下编则详细论述、评价现代新儒家援生命哲学入儒的理论得失。以人物研究为主，但又不局限于人物，而是始终将人物作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个案，放在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大背景下来研究，通过人物见思潮，又以思潮证人物，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梳理出生命哲学与现代新儒家之间的内在关联，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哲学的深度，从而避免了或就事论事、或泛泛议论之弊。一般认为，援引西方哲学入儒，是现代新儒家区别于传统儒家的重要特征之一。本书对新儒家学者生命化儒学的努力，作了许多中肯的分析评价，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应该说，在新儒家研究方面占有一席之地。

其三，资料丰富，立论可靠。众所周知，学术研究必须充分占有资料，只有依靠大量可靠的资料，才能科学地论证和说明问题。作者在撰写本书的几年时间里，不仅熟读了论主的各种著作，而且查阅了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资料和港台地区的图书资料，并关注学术界的最新动态。由于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使得立论有坚实可靠的基础，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最后，我想说一下，在学术研究受到商品经济强烈冲击，一些人急功近利、单纯追求短期行为的时候，作为一个青年学者，能不分寒暑、刻苦钻研，从事披沙拣金的艰辛劳动，这种精神是值得称赞的。同样，在“出书难”成为学界口头禅的今天，广东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我对他们的眼光和魄力，特别表示钦佩。青年学者的成长，离不开出版界的大力支持，

希望有更多的出版社来关注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推动学术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蔡少卿

2001 年 1 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序	蔡少卿 (1)
---------	---------

上编：生命哲学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复杂流变

导论：生命哲学东传的背景和实质	(3)
第一章 生命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13)
一、近代西方科学、理性的凯歌高奏	(13)
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涌起	(20)
第二章 生命哲学的精神特质	(27)
一、柏格森的生平与著作系年	(27)
二、绵延：一股无底无岸的“流”	(28)
三、“生命的冲动”——创造进化的原动力	(33)
四、直觉：把握实在的途径	(37)
五、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广泛影响	(41)
六、来自哲学塔尖的评论	(51)
七、倭铿及其精神生活哲学	(57)
第三章 生命哲学的东渐历程	(63)
一、对柏格森哲学的早期介绍和引用	(63)
二、倭铿生命哲学在中国	(66)
三、柏格森哲学的全面东渡	(71)
第四章 生命哲学与中国现代思想界	(86)

一、柏格森哲学与“五四”进步思潮	(86)
二、张东荪与柏格森哲学	(96)
三、朱谦之的“唯情哲学”	(105)
四、李石岑的人“生”哲学与陈立夫的“唯生论”	(121)

下编：生命哲学与现代新儒家

第一章 梁启超：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先驱	(143)
一、梁启超的生平与著作系年	(143)
二、晚年梁启超与现代新儒家	(144)
三、他乡遇知音：访柏格森和倭铿	(158)
四、“科学破产”第一声	(169)
第二章 梁漱溟：援生命哲学入儒的“新孔学”	(183)
一、梁漱溟的生平与著作系年	(183)
二、中西互释的“新孔学”	(184)
三、直觉体悟的认识方法	(208)
四、恒变的宇宙观与活泼向上的人生观	(220)
五、基于生命观念的中国文化复兴说	(231)
六、梁漱溟与“五四”	(240)
第三章 张君勱：中外合璧式的玄学	(248)
一、张君勱的生平与著作系年	(248)
二、介绍和传播生命哲学的使者	(249)
三、中外合璧式的玄学	(262)
四、摈斥物质文明——复活“新宋学”	(285)
五、“道并行而不悖”	(292)
第四章 熊十力：体用不二的“新唯识论”	(299)
一、熊十力的生平与著作系年	(299)
二、“新唯识论”与柏格森	(301)

三、心性本体的重建	(304)
四、“翕辟成变”的宇宙动态图式	(313)
五、“反求自证”的认识论	(319)
第五章 冯友兰：融合中西的“中道”哲学	(335)
一、冯友兰的生平与著作系年	(335)
二、哲学乃“求好之学”	(337)
三、“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	(343)
四、冯友兰、梁漱溟人生哲学及其方法之比较	(356)
第六章 贺麟：调和朱、陆的“新心学”	(369)
一、贺麟的生平与著译系年	(369)
二、“反省式直觉”与“透视式直觉”	(371)
三、自由意志论	(382)
四、神秘化的辩证法	(392)
第七章 方东美的精神生命论	(399)
一、方东美的生平与著作系年	(399)
二、独树一帜的新儒学大师	(400)
三、融会中西的生命哲学	(405)
四、“情理集团”：价值与知识的兼容互摄	(418)
五、生命精神的提升与落实	(425)
后 记	(432)

**上编：生命哲学及其在现代
中国的复杂流变**

导论：生命哲学东传的 背景和实质

环视当今世界，现代化浪潮锐势难挡。“现代”（modern）一词，既可以作为时间尺度来使用，更应该作为价值尺度来理解。就其内容和范围而言，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全球性、多层次的复杂过程。

欧美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业已表明，现代社会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想乐园，工业化国家的诸多负面现象，无不与现代化相伴而生。对广大后发达国家来说，现代化有着难以抵御的吸引力，同时又是值得诅咒的巨魔。一边诅咒着现代化，一边追求着现代化。这是历史的悖论，天底下的痛苦莫甚于此。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围绕着中国出路问题的数次争论，均与这一历史的悖论相关联。

从发生学的视野观照，西方的现代化是内源式的，是在反思、批判、改铸自己传统的基础上的逻辑延伸；而中国的现代化是外迫式的，属于“刺激——反应”（或曰“挑战——应战”）模式。西方的富强，坚定了我们走西化道路的决心，鼓起了我们告别传统的勇气；但西方的弊病，又使得心仪现代化的中国人犹豫彷徨，顾虑重重。既然现代化是我们的唯一选择，探索既能获取现代化果实，又可免蹈西方覆辙的现代化的合理模式，便成为中国人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直至今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仍应置于具有上述心理重负的历史情境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并在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得到健康的发展，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但探寻其历史渊源，则必须追溯到一百年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是二而一的事。始则从物质器械方面学习西方，继则从政治制度上模仿西方，最后则将学习西方落实在思想文化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指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使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惛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

要彻底改造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人生观，就必须引进西学。当时最受中国学人青睐的是进化论学说，柏格森哲学也是发挥进化论意义的，它与西方现代理性主义哲学一起传进了中国。在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新青年”派那里，它充当了解脱封建意识的束缚，建立自主自立的新型人生观的西学资源（详见本书上编第四章）。柏格森哲学之所以受到陈、李的看重，是由它那强调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特质所决定的，这些特质正好符合时代的需要。威尔·杜兰特指出：“在当代所有哲人中，柏格森对哲学的贡献最为珍贵。我们需要他对事物难以捉摸的偶然性，以及对精神改造世界的能动性所作的强调。我们原来接近于认为世界是一场现成的、命中注定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我们的首创性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觉，我们的努力也只是神祇们的恶作剧而已。但是，柏格森出现之后，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是我们创造力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6号。

的表演舞台和加工材料。在他之前，我们是一部巨大的、死气沉沉的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而现在，只要我们有这个愿望，就能帮助写出在创造之剧中我们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①

历史地考察，中国人最早介绍柏格森哲学的文字，出自文化保守主义者钱智修的笔下。1913年《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发表了钱氏所撰的《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初步介绍了“布格逊（即柏格森——引者）之进步哲学”。自此以后，柏格森生命哲学开始在中国知识界流行，并在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各个派别中得到了不同的回响。由于生命哲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声中传入中国的，对生命哲学的理解、接受、融会，不可能不打上历史的烙印，必然与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省和批判相伴随。像陈独秀、李大钊那样把柏格森哲学作为反封建道德价值、确立现代新型人生观的，毕竟不占主流，勉强可称为同道的仅李石岑、方东美（早年）、杨正宇等少数几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发生重大影响并占主流地位的，是有见于生命哲学乃对西方近代主智主义哲学的反拨这一事实，把生命哲学看做是对盛行于中国学界的科学实证主义的对治。这正是现代新儒家诠释柏格森、倭铿生命哲学的路数。

梁启超领导的讲学社计划每年聘请一位当代大哲来华讲学，罗素、杜威是最先延聘或续聘的两位著名哲学家。他们的中国之旅，不仅留下了自己的专业哲学，更带来了中国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转换，使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获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出路问题的理性认知。他们的影响，印刻在“五四”后期几次学术文化的争论中，对中国现代知识主义哲学的建构，也不无启导之功。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曾上演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科

① [美] 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471页。